

桐北二章

李国春

白沙岭

白沙岭上的车马曾经很慢。桐城士君子去京国的路上,必经此岭。岭高且长,人马劳顿三十里到此,除三十里铺上的兵铺、馆驿可作歇逸的去处外,再就是系马于松荫之下,捩衣来岭上那座“连理亭”前,取当年的春瓮,举觞祭夫子于西岩,饮友朋于南岗,以松枝击石而歌,作人生的又一次伤离远别。

连理亭曾构于古道旁。亭东是洪涛山起伏的岗峦,地接巢庐,万流汇聚于南乡水泽,菜子湖水天一色,沆瀣不见远山;亭西可远眺笃山,孤峰拔卓,遗世独立;若再远一些,极目望尽去舒六古道上的歧岭,隐约可见盘纤曲折的峻岭,让人陡然想起当年刘孟涂过此岭作“连峰相接、高人云表”的慨叹。

白沙岭上的“连理亭”,可视为桐城桂林方氏又一处祖庭。这一文化圣迹因白沙岭而为海内所闻,“亭”因“树”名,而树因人和,神而化之,连理抱合似悱悱君子,故名“连理”之树。倘若披春露秋风,伫立于连理亭中,读《棠棣之花》,真有望见五百年前方氏一门“兄弟既翕,和乐且湛”的美美情景。

连理亭构建于何年已不可考,亭子隳塌于何年也许更无人知晓。连理亭还原给了故纸散帙,成了远方的记忆,不过偶尔还能看见几位造访的海客,侧耳凝神听方氏族裔说起那亭子的故事,在旧年的古道旁,对历史兴废作没有仪式的凭吊。

白沙岭古道早湮没在蓬棘之中,几段车辙似可辨识,有人说,从前山岭逶迤,车马很慢。

衍《红楼》

在郑世德先生的心底,那块炼于鸿蒙之时、立于青埂峰下大荒之中的天外之物,有其形,也必有其质。形已藏在你我记忆深处,浑沌朴野,缥缈虚无,而质呢?未必有多少人去想。

在桐城北乡文化重镇大关,金星包装公司雅致的小楼上,《红楼梦》学习交流会会在霏霏夏雨中举行,这是一场由桐城部分喜爱“红学”人士参加的文化沙龙。当时主人郑老语惊四座:矗立在他心中的神来之石,也有具体的尺寸。

没有真正听明白郑先生所表达的本意,但我揣测先生所思必定是对自然的敬畏,对生命的思考。青埂峰下那娲皇氏弃之不用的顽石到底有多大?曹雪芹先生笔下写道:高经十二丈,方经二十四丈。十二、二十四,再加上炼成的五色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,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,这些数字与年、月、日、节气多么地近似,但似乎更与古代象数中的某些卜辞若合符节。中国人在记叙洪荒时代的人与物事时,往往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宗教色彩,这是中国人最初的天道观,是中国文化的黎明。

本着朴素的天道观,郑老先生心中的那块神石既有了生命,则真如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平凡人一样,有质有形,有前世的因缘凑泊,也有今生的体貌呈现。在读者的眼中,神石大得广袤无垠,又小如袖珍文玩,各人皆有其独特的审美体悟以至生命体验蕴藉其中。

郑老先生穷毕生心血,韦编三绝,与《红楼梦》里一个个人物晤对,索问群芳,岁月几何?又孰长孰少?一如曹氏之痴情,先生竟考稽出宝、黛、十二钗及诸仙子的实际芳龄来,令听者惊诧,而细思起来,实在是他在向一个个活泼生命精神去寻觅。即使是那尊顽石,也要穷其原委,还其本性。

警幻世界里,玉树琼花,石也具有性灵。现实生活里,人人心中也有一块若轻若重若大若小的顽石,开化当在各人的修为,诚如《红楼梦》初拍成电视剧,甫一播出,飞来之石横亘在您的眼前,摄魂夺魄,《枉凝眉》乐曲奏起,如梦如幻,似从鸿蒙走来,随即又钻入你的心扉。一部《红楼梦》,要解开的文化密码太多,曹雪芹先生曾含泪咏道,“悲喜千般同幻渺”,读者以为如何?郑老先生仿佛若有所悟。

静立
汤青
摄

注视与斜睨

冯渊

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,爱好文学的成本最低。第一,不需要行头;第二,似乎也不需要禀赋,识字就行。

我十多岁时看了刚复刊的《少年文艺》,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贝多芬,可能是根据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缩略的。即便如此,那里面的文字,以及文字上方氤氲出来的气息,是我从未经历的,我用一个淡绿色塑胶皮的64开笔记本,摘录很多这样的句子:

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。——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。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。但在静止的空气中,已经有隐隐的威胁,沉重的预感。然后,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,悲壮的雷吼,充满着声响的、可怖的静默,一阵复一阵的狂风……当风狂雨骤之际,黑暗裂了缝,夜在天空给赶走,由于意志之力,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。

词语还可以这样组合!此前,我感受到最文艺的句子是“荡起小船儿,南风轻轻吹”和“长夜难明赤县天”。

那个学期,我开始写自己的传记。我觉得我这一生一定是不平凡的,必须只争朝夕,记录下我的一切,思考我的未来,我的计划是远洋航海,与大海和天空作伴。

在我进行宏伟人生规划时,中考很快就来了。必须应对考试,传记写了序言就永远停止了。我将全副精力投注到数理化的学习中,在极为有限的空闲时间里,我读到了数学老师收藏的“中国现代文学大系”中的一本小说选,他订阅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,还有我父亲单位订阅的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人民文学》等,阅读这些,相当于今天的小朋友偷玩游戏。所幸,考试还算顺利,我14岁升入了师范学校,告别了做题时代。

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学校图书馆任意阅读。那时没有整本书阅读的概念,我不知道读什么书,全凭撞大运。第一次借书,是班级集体行为,同学抬了五十本书放在讲台上,我捡到一本封面残缺用牛皮纸覆盖的《围城》,看了半天,不知道他在说什么,那些俏皮话离我的认知和阅历都很遥远。

后来看歌德、普希金、托马斯·曼,也看约翰·洛克和夸美纽斯,李斯特威尔和苏珊·朗格,许多是刚出版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,在这个江南小城,这些书陪伴了多少寂寞少年;更多的书,陪伴的是书架和嘶嘶作响的图书馆的日光灯。多年以后,学校解散,这些泛黄的图书不知流散到哪个角落了,摩挲过这些书页的手,也骨节粗大皮肤干枯了。我读这些书像饥渴症一样,胡吃海喝,不辨营养,许多书囫圇吞枣,只是看了而已。

那时我以为自己将要成为普希金、歌德式的人物。和亲密的朋友在湖水、高山、竹林、丘陵之间奔走,大声读诗;在山上辨认俄罗斯文学中的白桦树,德国文学中的山毛榉。

我学着写诗、小说、评论、散文。有的几万字,有的几千字。1986年5月,我的第一篇散文,经沈天鸿老师修改,发表在他主持的《安庆

新闻报》“大观”副刊。在报纸的左下角,几百字,题名《洁白的黄昏》。这是一张小报,但常常有全国的名诗人,包括海子,在此留下踪迹,责任编辑沈天鸿在新诗领域,当时已名噪天下。

十八岁,我毕业回到家乡,做了九年乡镇中学教师。

九年时间里,我认真教书,从化学到语文,从初中到高中,从三级教师到一级教师。业余时间,读书写作,我知道宇宙的中心不在安庆,但我能够得着的只有《安庆日报》这类报纸的副刊。我常常望着学校前边大路上乡邮员的绿色身影,期盼他送来报纸,如果某天报纸的“大观”副刊上有我的文章,我就能高兴整整一个星期。一个人能将二十多岁的大好时光浪费在这些期盼上,可见他有多大出息。

我早忘记了小时候对自己的期许。哪有大海和歌德,只有村口的泥塘河与乡村教师的满身尘埃。

忘记少年时期的宏伟理想不是什么难事,生活的尘埃很快落满皮肤的每一道褶皱。很多时候,人只能看清楚身边的一点点淡红的微光,远处是什么,我要做什么,置身其间,无知无识。我用那么多的热情追逐一个渺不可及的梦,最终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。

1995年夏天,我离开故乡到皖北的一个城市重点中学任教,告别了“大观”和文学梦。

今年春天,我收拾阁楼,找到一个纸袋,发现里面是一堆发黄变脆的报纸。我坐在地板上,一一看过去,居然有近百张发表我文章的样报,安庆、马鞍山、阜阳、合肥、蚌埠、淮北等地的报纸,还有河南驻马店市的《驿城晚报》。2000年之前,我写了这么多豆腐块啊。但是,仅限于此。

从“大观”副刊走出来的与我同龄的作家,我熟悉的只有徐迅、洪放等不多的几位,许多人早就休止了文学梦。这样说来,本文开头关于爱好文学不需要成本的说法得修正一下:你爱它,可以;想让文学回馈你,太需要禀赋了。这两天我在命制本区高考模拟卷,翻到方孝孺的一篇文章,里面有这样一段话:“斯文世以为细事,然最似为天所靳惜。其赋于人也,铢施两较,不肯多与。”我左看看,右看看,终于明白:老天爷对我,是真的锱铢必较。

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,二十多年以后,我居然又向“大观”副刊投稿。厚颜敲开上个世纪就已经对我关上的大门。由此结识了新的编辑,还成了尚未谋面的朋友。当然,今天的写作已经没有了少年时写作的那种焦灼和期盼。

这些年来,我在语文教学研究方面用功,发表了一些文章,出了几本书。我坐在教室后边听课,与老师们交流,然后在办公桌前凝神静思,写下的文字,属于对专业的“注视”。这是我吃饭的行当。

近两年,我有时将工作上的思考推到一边,不想正襟危坐;我斜欠着身子,透过窗户,看看远处的树影和天空,“斜睨”片刻,重新写下一些不三不四的文字。

老天爷,会不会哀怜我一点?